

富的学术资源和开放的学术环境；二是要针对博士生在线课程学习、学术交流、师生互动等方面存在的壁垒精准施策，提供多样化的学业支持、学术支持与导学互动支持，保障博士生潜心治学，提高学术职业获得感和认同度。

参考文献

- [1] MERTON R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365-387.
- [2] AURIOL L. Careers of doctorate holders: employment and mobility patterns[A].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10(4): 1-29.
- [3] 辞海(缩印本)[Z]. 1989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1221.
- [4] 李永刚. 成为研究者: 理科博士生素养与能力的形成[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140.
- [5] BAKER V L, PIFER M J.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doctoral student to independent scholar[J]. 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2011, 33(1): 5-17.
- [6] 徐岚. 从导师指导过程看立德树人对博士生社会化的作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5): 51.
- [7] 包志梅. 高校课程教学对学术型博士生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基于 7719 名学术型博士生的调查[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3): 119-128.
- [8] 高端. 人文社科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影响因素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3): 156-162.
- [9] 张茜. 理想与现实之间: 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的张力及其消解[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3): 94-101, 109.
- [10] 拉潘塔, 博图里, 古德伊尔, 等. 正确处理技术、教学法和新常态三者关系: 后新冠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挑战[J]. 中国远程教育, 2022(3): 26-41, 77.
- [11]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329.
- [12] 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13]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329.
- [14]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248.
- [15] 潘秋静, 胡永红, 阙明坤.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挑战与创新——访世界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乌尔里希·泰希勒教授[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 18(6): 15.

(责任编辑 周玉清)

DOI: 10.16750/j.adge.2023.07.009

走入考研循环： 从有限理性视角 看大学生考研决策行为

宫颢韵
田浩然

摘要：通过对 16 名经历过多次考研的大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有限理性”为理论基础对其决策及行为表现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完全和社会环境的客观限制条件下，倔强与高自尊的性格特征与“名校情结”是影响“多战”考生决策理性的主观条件；从众效应、锚定效应、过度自信和沉没成本效应等非认知心理因素进一步推动着他们走入考研循环；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快速的情绪调节能力、审慎“求稳”的目标定位和合理规划与严格执行是循环终结的必要

条件。最后从提供信息支持、补充“考研后教育”、营造积极环境等角度提出建议，以期帮助考研学生破除心理与行动困境。

关键词：考研；有限理性；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宫颢韵，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田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简称“考研”）是指教育主管部门和招生机构为选拔研究生而组织的相关考试，由国家考试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组织的初试和复试组成。自 2015 年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屡创新高。2022 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博士生资助对学生读博意愿的影响”（编号：22XNQ19）

达 457 万, 但仅录取 110.7 万, 录取率为 24%, 相比前一年下降 4 个百分点, 考研俨然已成为“二次高考”^[1]。

由于报名人数剧增和推免比例扩大等原因, 考研成功的难度逐年攀升, 应届生考研成功的比例降低, 多次考研学生(“多次”即三次及以上, 下称“多战”考生)的增多进一步助长了“考研热”。对考生而言, “多战”不仅是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 而且承载着个人成长、自我证明甚至“救赎”的期待。“多战”选择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能否如愿又何以打破失败的循环? 本文引入“有限理性”的理论视角分析“多战”考生的决策行为, 通过访谈 16 位“多战”考生, 解析他们陷入、维持以及走出循环的过程, 为破除相关的心理或行动困境提供启示。

一、理论与文献述评

1. “有限理性”的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最初由 Arrow 提出, 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 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2]。当代认知心理学先驱 Simon 发展并完善了“有限理性”理论,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指出:“理性是在给定条件和约束限制范围内对实现特定目标而言适当的行为方式”, “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理性, 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达到”^[3]。Taylor 则分析了理性选择有效的条件, 即可作选择有限、实质诱因清楚、行动选择对个人有重要意义、有前车之鉴。由于难以悉数满足上述条件, 人们的行动选择往往偏离最优路径^[4]。有学者将人类理性的限制因素归纳为认知能力发展水平、非认知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等, 其中, 包含情绪、动机、社会等层面在内的非认知心理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更为明显^[5], 非认知情绪、动机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干扰能够经由态度削弱理性能力的发挥^[6]。在高等教育领域, 已有研究将“有限理性”相关理论应用于大学生专业选择^[7]、学术不端^[8]和就业误区^[9]等问题, 将信息、能力和主观意愿等的不足视为大学生决策和行动偏离的重要原因。

2. “考研热”现象与考研选择行为

在经济学视域下, 学者们从市场供求、考研流

动性均衡、成本-收益等层面探讨考研人数激增的成因^[10-12]。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看, “考研热”折射出大学生在“学历贬值”的就业行情下, 希望借助研究生教育实现“纵向流动”的理想^[13]。近年来, 备考低年级化^[14]、“考研基地”增多^[12]、往届考生比例升高等现象, 反映出我国大学生在宏观体制与客观形势的交叠影响之下的行动困境。有学者指出, 考研动机和行为受内外因共同影响, 内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15], 考研成功的学生的动机多出自理性而非盲目, 往往具有目标明确、准备充分等优点^[16]。多项国内研究表明, 个体特征、高校教学环境、学业成绩、就业压力、父母愿望或鼓励等是影响考研意愿的主要因素^[17-18]。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个体特征和外界影响等对升学意愿和行为展开研究。个体特征方面, 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对读研选择有显著影响^[19-20], 有证据显示性别和种族差异几乎无影响^[21], 而关于个体内在的、预期的主观因素的实证结论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本科时的主观规范和自我效能能够正向预测读研意愿^[22], 个人的就业或收入预期也呈现显著正效应^[20-21]。外界影响方面, 相关研究基本都观测到来自家庭、朋友、教师、院校等的支持与读研选择之间存在积极关联^[23-24]。

“多战”考生已经闯入大众视野, 他们在决策与行为表现上“因时而变”, 更易滋生负面的心理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但目前鲜有研究基于新近“考研热”背景探讨考研话题, 对“多战”现象也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基于“有限理性”的视角, 考察理性限制条件在考研过程中的情况及变化, 分析“多战”考生进入“考研-失败-再考-再失败”循环的前因后果, 思考教育部门、高校应如何针对不同决策类型、不同应考阶段的考生, 帮助他们破除理性限制条件。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2019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元年”, 当年毕业的大学生正值新近的“考研热”, 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 2019 年前后本科毕业的“多战”考生。考虑到将正在经历“考研循环”的考生作为研究对象可

能面临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访谈对象主要选择已经获得研究生录取资格的考生。由于潜在对象不仅总体数量较少,且他们不愿意向周围人主动暴露相关经历,甚至有意回避,访谈对象招募工作在前期进展缓慢。因此,研究引入滚雪球抽样法,希望参与者引荐满足特征的对象^[25],并通过 bilibili、抖音等平台检索“考研”“多战”等话题,邀请相关博主参与访谈,以增强对象的特征广泛性,并确认信息饱和度,最终获取 16 名访谈对象(见表 1),他们均已获得“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录取资格。

2. 研究方法

首先,以研究对象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预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包括考研动机、目标定位、情绪状态变化、坚持考研的原因和自我评价等内容。访谈工作于 2022 年 4 月到 7 月进行,每次访谈时长为 1.5 小时左右,在获得访谈对象允许的前提下,以录音的方式回收访谈资料。访谈结束后,将所有录音逐字逐句转录为文本,共获得访谈文本资料约 20 万字。

三、考研循环中的有限理性: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审视

有限理性的含义可以表述为:“人是理性的,但

理性会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是有界限的或有限度的。”^[6] 访谈发现,“多战”考研行为中也存在特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着理性的发挥,在考研“循环”全程中起到关键的源动力作用。

1. 倔强自尊的性格与“名校情结”的追求

弗洛姆在诠释信仰与理性的基础之上,将理性信仰归因于主体的性格结构,性格被定义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26],它使得人们的思想、行为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被统合成为一致的整体,人们根据自身的性格结构行动,也由此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不服输”“不后悔”“不甘心”“不留遗憾”等与性格特征相关的词汇在访谈中重复出现,不难看出“多战”考生在遭遇重重失败时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冲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一位二战失败后只身北漂,工作一年后再度考研的受访者将考研比作“种下一颗种子”,“只要在心里扎下根之后,必须开个花结个果。要不然觉得一路下来都有遗憾”(A13)。

仅靠利弊取舍的压抑难以刨除“考研”这颗种子,“不甘心”的考研人选择优先满足心理需要,认知能力、反思能力和智慧力量的运用不再充分,决策理性为性格特质这一主观条件所约束。“多战”考生的性格特质可以用“倔强”一词概括,解释为“刚

表 1 受访对象基本信息

编码	性别	籍贯	联系渠道	考研次数-年份	本科专业	中途有无工作
A1	男	四川成都	引荐	3-2019/2020/2021	经济学	无
A2	男	四川攀枝花	引荐	3-2020/2021/2022	金融工程	无
A3	男	山东临沂	引荐	3-2020/2021/2022	市场营销	无
A4	男	云南昆明	网邀	3-2020/2021/2022	网络工程	无
A5	女	福建宁德	引荐	3-2020/2021/2022	法学	有
A6	男	四川达州	引荐	3-2018/2019/2020	国民经济管理	无
A7	男	吉林白城	引荐	4-2019/2020/2021/2022	土木工程	无
A8	男	云南昆明	引荐	4-2019/2020/2021/2022	金融双语	无
A9	女	河南郑州	网邀	4-2019/2020/2021/2022	经济学	有
A10	男	湖北鄂州	引荐	3-2016/2017/2019	心理学	有
A11	女	陕西渭南	引荐	3-2020/2021/2022	心理学	有
A12	男	内蒙古巴彦淖尔	网邀	3-2019/2020/2021	自动化	无
A13	女	山东聊城	网邀	3-2018/2019/2021	动物医学	有
A14	男	吉林长春	引荐	3-2019/2020/2021	自动化	无
A15	男	湖北武汉	引荐	3-2020/2021/2022	新闻传播	无
A16	男	河南巩义	引荐	3-2020/2021/2022	行政管理	有

强、不屈服”，拥有这样性格特质的人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会生发出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愚勇”(A5)。

此外，他们还具有高自尊的特点。步入考研循环的学生不仅具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希望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尊重。经历专升本、再经历三次考研最终考入某“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的受访者这样解释自己的“多战”动机：“想要证明给其他人看，本科普普通通也是可以考上A大的，我是具有那个实力的。”(A3)而对于曾经的“优生”来说，考研失败击碎的不仅是考前的雄心壮志，还有过往的荣誉光环，自尊心所遭受的打击更甚。本科来自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A9说道：“无法想象几年后我竟不能像中学时与我旗鼓相当的同学一样成为研究生，我无法接受他们有‘光明的未来’，而我只能黯然退出这个赛道，所以我必须是研究生。”考研成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或终点，更具有重塑自尊的工具意义。对于深陷循环的“多战”考生而言，考研成功是弥补心理缺憾、认可自我能力和重寻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

个体性格是先天生和后天养成的融合体。多数受访人拥有高考失利的经历，在不具有保研资格的情况下，考研成为他们这样的“普通”学子进入名校的最后机会。“名校情结”在他们内心根深蒂固，这也在访谈中被频频谈及。“我出身‘卑微’，不满足于现状。我想去到大城市，去到更好的学校来看得更高更远，我是有一定的名校情结……我绝不会调剂去普通学校。”(A3)性格特质决定着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影响着行为决策。不甘认输的完美主义者失败了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在思考是否继续考研的时候，难以结合外部信息和自身处境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理论上可能是更理性的)，从而限制了理性能力的施展和发挥，削弱了对待“多战”考研的认知理性。

2. 信息不完整的现实和焦虑内卷的环境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界定人类理性必须充分考虑其发挥作用的环境的要求，无法撇开特定的环境条件来界定理性或判定人们是否理性，也无法撇开人的理性来认识和改造环境^[6]。信息不完全是考研学

生试图理性决策时面临的巨大问题，而考研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信息战”(A4)。与“老师带学、集体作战”的高考不同，考研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从定位报考院校到寻找参考书目，从求助成功经验到制定备考规划，以及了解竞争者的数量和能力等，都蕴含着庞大且广泛分布的信息量。作为一个应届大学生，往往难以获取完备信息。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考研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洗衣服。不知道洗得怎么样，不知道洗得对不对，也不知道衣服洗干净了没有。只有考试那天，才能把衣服拿出房间，看衣服到底洗干净了没有，所以只能闷头洗。”(A16)

超越考研学生的个体特征与现实环境，将“多战”考研置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来考察，可以发现，由于社会长期将考试通过与“功名”获取二者相捆绑，“考上就一好百好”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大众心中。学生对于经由考试获取“成功”形成了自然的心理认同。“九年义务教育，参加高考，上大学，读研……考研在我的人生规划里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没有明确的动机，没有为了逃避工作或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好像考研只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A11)

文化结构发挥如此影响，不仅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历史传统有关，也与当代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关系密切。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突发事件的冲击导致劳动力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使得曾经“金贵”的读书人乃至研究生不再稀缺。在探索到更优的人才评价与筛选机制之前，用人单位对应聘者学历的重视有增无减，进而将求职市场进一步推入“学历内卷”之境。多位受访者提及，自己如果以所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将面临极为弱势和下风的处境，纵使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很艰难。四度考研后进入某顶尖商学院的受访者表示：“金融本科毕业的话，并不能找到高端工作，可能去银行做柜员或普通公司做财务。”(A8)

应届生们被裹挟着进入非自愿的竞争场，焦虑和攀比心持续发酵，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只得付出更多努力，甚至只是“为了奔跑而奔跑”，“毕竟，在百舸争流、生怕掉队的环境里，没有人敢停下来，也没有人能真正停下来。”(A5)

四、走入循环：限制“多战”考生的非认知心理现象

弗洛姆认为“理性信仰”是在理智与情感的创造性活动中，对自身的真实状况与真实体验的洞察，以及对自身思维、情感等能力的了解和信赖^[27]。考研学生如果在非认知心理现象的操纵下丧失理性的自我审视，无论再考多少次都只会是空转的循环。

1. 从众效应预示考研循环的开始

当信息获取不足时，决策者容易产生认知趋同现象，社会心理学称之为模糊条件下的“从众效应”。从众是指个体在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下，在知觉、判断、动作、信仰及行为上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的现象，在群体环境下的决策活动中普遍存在。在第一次选择是否考研时，包括“多战”考生在在内的大量应届生均是“随大流”地投入考研大军。“第一年对考研了解还不是很深入，感觉就是我应该去考，我要这么做。但是具体为什么，对每一个阶段的定位，没有那么清楚。”（A11）

Deutsch 和 Gerard 认为，从众行为是为了获得社会支持、希望被群体接受，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及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感受^[28]。考研的从众更倾向于信息从众型而非规则从众型，即有意或无意地将身边人的行为或观点作为可用于自己做出判断与决策的信息。一位受访者评价自己第一次考研的状态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为逃避就业……室友说‘不如考研吧，我这复习几个月感觉还行’，听室友一说，我当时就这么做了。”（A10）

“从众考研”一是源于应届生们没有或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就业偏好模糊，对主客观情况认知不准确，不能科学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二是与独立搜集信息相比，观察和模仿其他人的毕业决策更容易、成本更低。从众效应可能导致个体做出扭曲乃至错误的决策行为，在过分从众的情境中选择考研的学生将饱尝其带来的失败苦果，也预示着考研循环的开始。

2. 锚定效应导致目标设定的偏差

心理学家 Kahneman 将锚定效应列为决策者重要的非理性特征之一。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下，个体的判断和决策结果或目标值受到先前呈现

信息的影响，导致目标值向初始值即“锚”的方向偏离，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29]。Strack 和 Mussweiler 提出通达模型以解释锚定效应的产生，即人们在判断过程中会先假定锚定数值是正确的，然后寻找支持假设的证据，进而估算偏向于锚定值，体现了一种积极证实倾向^[30]。部分“多战”考生存在每次报考院校目标的定位均居高不下的情况，甚至在经历失败、重整旗鼓之后，“反而想选择更大的目标，想法更大”（A12）。

对锚定值的注意程度越高，其锚定效应越明显^[31]。如果将第一次考研院校目标定位看作初始的锚定值，那么，这一估计起点往往将持续影响此后数次的院校目标重新定位。一位受访者这样讲述自己多次择校的心理活动：“一开始报清北复交这种档次的学校，后面让换一个低的学校，就很不甘心。”（A8）在判断偏差的作用下，考研学生“在择校时，没有深思熟虑的纠结曲折。有的只是一腔孤勇”（A1）。

当然，其中也不乏信息不完全的因素。当认知信息详尽度较低时，人们难以搜索更多信息以供加工，便倾向于依赖自身经验、主观倾向或受情绪的支配^[32]。在接连经历考研失败后，某些始终无法完善信息的考研学生不肯下调自己的预期，周而复始地追逐着自己设定的“锚”，在考研循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3. 过度自信促使“再来一次”的冒进

“过度自信”一词源于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很难对自己的能力做出准确的自我评价^[33]，时常过于自信，给出不现实、虚高的评价，最后导致不理性的决策^[34]。在行为金融学领域，过度自信的“乐观投资者”会盲目、冒进地进行多次交易，而过度交易会增加交易成本，对整体的期望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类似地，“多战”考生往往对未来结果有一种盲目的乐观，相信再来一次就会朝期待的方向发展，在考研赛道上一次又一次地跌倒、爬起。“我深信自己再来一次的话，吸取经验教训，明年一定大有机会。”（A2）

当投资者在面临难度较大的问题时，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反应，这被称为“难度效应”^[35]。屡遭淘汰的“多战”考生普遍承认考研成功的高难

度性,但也正是由于它的高难度模糊了考生对自身水平及其与竞争者之间差距的认知,使得他们面对再次考研的难关时形成控制错觉和过分乐观^[36]。一位心理学跨考统计学的受访者谈到:“一战是裸考专业课,那次题特别难,统院学生也就考100出头。我数学底子还行,有90多,因此感觉差距不大,这莫名鼓励了我。”(A10)

过度自信的产生也与决策者的成败归因倾向密不可分,过度自信者通常存在自我服务归因偏差,是指个体对积极结果进行内部归因,对消极结果进行外部归因的倾向^[37],高自尊者更易进行自我服务归因^[38]。“多战”考生虽然并不否认失败的原因包括备考规划、学习状态等内部因素,但也多次提及考试科目、参考书目、考研形势、院校报录比等外部因素的突然变化,是导致落榜的重要原因。“只是那年报的学校报名人数翻了三倍,分数线涨了将近80分。其实我有实力上的,所以我决定继续考。”(A4)

4. 沉没成本酿成“骑虎难下”的窘境

沉没成本效应是指决策者因受沉没成本的影响而继续投入成本或做出某一行为的非理性决策现象^[39]。从理性出发,沉没成本不应影响考研决策,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经历过两次失败的考生来说,以时间为主的成本损失已经发生,倔强且高自尊的群体会选择继续再战,随着投入的成本继续增加,他们更容易身陷其中难以自拔,“颇有骑虎难下之势”(A7)。

决策者首先将沉没成本评估为损失,终止投入不仅意味着沉没成本付诸东流,更是将可能损失立即转为确定损失,而继续投入不仅提供了挽回损失的机会,甚至可能带来潜在的收益^[40]。“越到多战,考虑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到二战失败的时候,丢失了应届生的身份,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好像没得选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A8)

自我申辩是沉没成本效应形成的重要心理动机之一^[41],即由于决策者不愿意承认决策失误,企图通过继续投入以证明决策的合理,从而表现为沉没成本效应。考研失败的学生不但会盘算过往投入,还会故意寻找论据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一位受访者通过放大考研失败的消极影响以说服自己“必

须坚持下去”。“到了四战,就涉及我是否会随意地结婚及工作,乃至人生的自信、做人的底气和命运轨迹。如果不能上岸,一切都由不得自己选择了。”(A9)

五、结论与讨论

谈及“多战”考生,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是冲动的、偏执的、非理性的,但越发普遍的“多战”现象提醒着我们,这并非都出自于个性化的冲动,有必要审慎看待他们的动机与遭遇。本文以“有限理性”为理论基础,通过近距离观察“多战”考生走入、维持以及走出“考研循环”的过程,探讨其群像特征与所处环境,进而具体分析他们显性且特殊的非认知表现与行动策略。

1. 研究结论

如图1所示,性格特质与感性追求是考研学生落入循环并越陷越深的前置性因素,也是循环能够维持的源动力,倔强自尊的性格特质驱动着以“名校情结”为代表的感性追求持续发酵,注定了“多战”考生在考研道路上怀揣着“英雄主义”(A1),在压力和挫折的荆棘中头也不回地前行。按照Simon所提的“有限理性”本义,它更多地是指外部环境给人的理性带来的约束。“多战”考生的行为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观,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多重约束。对信息的占有和利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备考的难易和录取机会的多寡。同时,文化传统造就的考试思维固化、竞争心态及“内卷”焦虑,依然笼罩着已经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们。

在“多战”考研过程中,限制理性的非认知心理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从众效应、锚定效应、过度自信与沉没成本效应,它们并非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交互效应以及时间上的先后继发。应届毕业生们可能在从众效应的驱使下仓促地踏上考研轨道,而锚定效应则使得他们在确定目标院校时难以客观地对标,并在此后数次院校定位中持续发挥作用。第一次失败并不足以唤起考生充分的自我审视,未尽全力的他们在不上不下的成绩中反而会得到“自信”,进而支撑着他们选择再考一次。到了决定是否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考研之际,“多战”考生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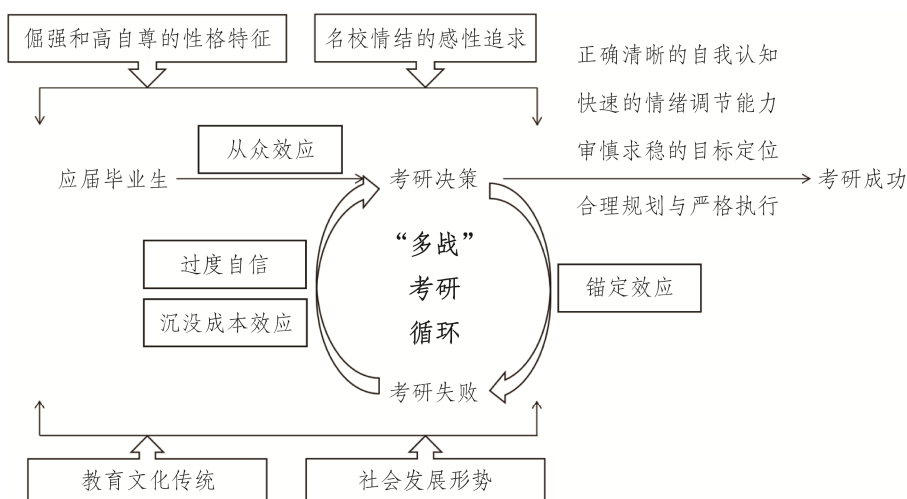


图1 “多战”考研循环的形成与破解机理

割舍巨大的沉没成本，故而走向了下一个循环，只有成功“上岸”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2.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多战”考生如何打破有限理性的桎梏，从而走出考研循环的必要条件给予了关注。①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考研成功是“实力和运气的结合体”，“运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选择，而选择又取决于自我认知、参考信息和坚持上”（A7），从众效应、锚定效应和过度自信等无一不与自我认知模糊或偏差密切相关。②快速的自我调节能力。情绪调节是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情绪的过程^[42]，与理性发挥关联甚密。相关研究在评估青少年应对负性事件的认知情绪调节能力时，理性分析即为适应性策略的重要测量维度之一^[43]。③“求稳”是审慎思考后的定位倾向。虽然“求稳”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但对于“多战”考生来说，从最初的追逐天花板到“求稳”心态应理解为趋利避害的理性转变。“因为毕竟是三战，不能老是拖下去，所以更加求稳。”（A12）④合理规划与严格执行。“决定上岸的，不是时间堆砌，而是保证有效时间和完成规划的学习任务。”（A10）对于走出循环的“多战”考生来说，那些艰难岁月的遗憾和伤疤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羞赧，他们终于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戴着浴火重生的勋章进入崭新的故事。

在考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之外，笔者从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社会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和健全考研信息发布渠道，形成“国家主导、高校着力、市场补充”的信息网络。针对官方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低效信息繁杂等问题，招生考试管理部门需加强信息的整合、发布与更新，敦促高校信息发布提质增效，尤其应提前发布重大的招生信息变动，规范市场信息的交易和传播，同时畅通考生咨询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在本科毕业教育中加入“考研后教育”板块。建议高校为准毕业生提供专项心理辅导课程、创新型实践项目、同辈交流帮扶平台等，帮助“考研后”学生对“二战”形成更为客观全面的认知，树立正确预期，合理定位目标，理性权衡再考选择。

（3）营造积极、正能量的舆论环境与话语空间。诚然，短期内很难转变由社会文化传统造就的名校学历推崇与对考研落榜生的负面评价，但不应放弃通过媒体宣传来营造平和、理性的舆论环境。只有消解当下过载的外部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帮助考生在任何时候都能轻装上阵，有效地运用个人的理智去行动。

参考文献

- [1] 熊丙奇. 考研热折射出人才评价存在的问题[N]. 光明日报, 2020-12-29(2).
- [2] 阿罗. 信息经济学[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122.
- [3] 西蒙. 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8: 179.

- [4] TAYLOR M. Structure, culture and action in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change[J]. *Politics & society*, 1989, 17(2): 115-162.
- [5] 刘永芳. 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J]. *心理学报*, 2022, 54(11): 1293-1309.
- [6] THALER R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9, 12(3): 183-206.
- [7] 吕慈仙, 李卫华. 高校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1): 81-85.
- [8] 余应鸿, 张翔. 有限理性语境下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6): 35-41.
- [9] 李飒飒. 有限理性视域下的大学生就业误区与消解对策[J]. *江苏高教*, 2017(2): 84-87.
- [10] 高玉梅. 大学毕业生“考研热”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6): 88-91.
- [11] 李红霞. 对当前“考研热”的调查与经济学分析——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两校为例[J]. *青年研究*, 2002(3): 38-43.
- [12] 唐润华. “考研基地”形成机理、映像与正确认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2): 89-93.
- [13] 熊倪娟, 赵东辉, 施祖麟. 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2): 47-54.
- [14] 蔡红建. 大学生盲目考研不可取——考研低年级化现象反思[J]. *人民论坛*, 2018(36): 106-108.
- [15] 薛深.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考研动机调查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04(30): 3.
- [16] 李国昌, 任笑良. 成功考研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S1): 145-148.
- [17] 燕艳, 李志广, 张祥沛. 就业压力对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影响的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3(3): 55-58.
- [18] 鲍威, 张倩. 扩招后我国研究生入学选择的实证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09, 7(5): 5-11.
- [19] JUNG J, LEE S J. Exploring the factors of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in South Korea[J]. *Higher education*, 2019, 78(5): 1-16.
- [20] ZHANG L. Advance to graduate education: the effect of college quality and undergraduate majors[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28(3): 313-338.
- [21] BORREGO M, et al. Pursuing graduate study: factors underlying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students' decision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8, 7(1): 140-163.
- [22] TO W M, et al. Intent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J]. *Educational studies*, 2014, 40(3): 292-309.
- [23] GUERIN C, JAYATILAKA A, RANASINGHE D C. Why start a higher degree by research?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to undertake doctoral studie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5, 34(1): 89-104.
- [24] LIU D, MORGAN W. Students' decision-making abou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t G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 role of family and of teachers[J].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016, 25(2): 325-335.
- [25] 孙晓娥. 深度访谈研究方法的实证论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2(3): 101-106.
- [26]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71.
- [27] 周文. 基于创发性性格取向的“理性信仰”——浅析弗洛姆对理性、信仰、怀疑的辩证思考[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4): 148-151.
- [28] DEUTSCH M, GERARD H B. A study of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s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J].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5, 51(3): 629.
- [29] 王晓庄, 白学军. 判断与决策中的锚定效应[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1): 37-43.
- [30] STRACK F, MUSSWEILER T. Explaining the enigmatic anchoring effect: mechanisms of selective acces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3): 437.
- [31] 唐卫海, 徐晓惠, 王敏, 等. 锚定效应的产生前提及作用机制[J]. *心理科学*, 2014, 37(5): 1060-1063.
- [32] 王晓明, 李雯, 周爱保. 认知信息的详尽度与锚定对决策策略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11, 34(1): 172-176.
- [33] FERRARO P J. Know thyself: competence and self-awareness[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010, 38(2): 183-196.
- [34] MOORE D A, HEALY P J. The trouble with overconfide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8, 115(2): 502.
- [35] GRIFFIN D, TVERSKY A. The weighing of evidence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confidence[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92, 24(3): 411-435.
- [36] 沈卓卿, 董妍, 俞国良. 过度自信的信息差异理论模型[J]. *心理科学*, 2009, 32(6): 1405-1407.
- [37] BLAINE B, CROCKER J. Self-esteem and self-serving bias in reactions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an integrative review//BAUMEISTER R F.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55-87.
- [38] 田录梅, 李双. 自尊概念辨析[J]. *心理学探新*, 2005(2): 26-29.
- [39] ARKES H R, BLUMER C.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85, 35(1): 124-140.
- [40] TYKOCINSKI O E, ORTMANN A.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our past experiences: the sunk-cost fallacy and the inaction-inertia effect[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5(9): 653-664.
- [41] FRIEDMAN D, et al. Searching for the sunk cost fallacy[J].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07, 10(1): 79-104.
- [42] GROSS J J, THOMPSON R A. *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foundations*//GROSS J J.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7: 3-24.
- [43] 朱熊兆, 罗伏生, 姚树桥, 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2): 121-124, 131.

(责任编辑 周玉清)